

姚莹論詩絕句六十首註

黃季耕 注

黃山書社

黄季耕注

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注

黄山书社

责任编辑：王政白

封面设计：方绍武

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注

黄李耕 注

黄山书社出版

(合肥市迴龙桥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.875 字数：8,6000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2,200

统一书号：10379.20 定价：0.70元

姚莹及其论诗绝句六十首初探

(代序)

一

姚莹(1785—1852)，字石甫，一字明叔，晚年号展和，又号幸翁。嘉庆十三年(1808)，他二十四岁时中了进士。早年游幕广东，后在福建、江苏任知县。鸦片战争时，道光皇帝在一八三〇年特旨提拔他为台湾道。晚年任广西按察使。他渴慕贤能，鄙视奸佞，立功励名，诚挚务实，居官廉洁，但个人却是“至今官廨外，盖头无一椽”(方东树《寄石甫》)。正如他自己在《峡江歌》中所歌咏的：“江水如此使我清，得葬清波死亦足。”可见其人品一斑。

慷慨尚义，乐施好助，是姚莹为人的一个特点。他对“族亲贫者数十家，恒资之举火”，以至长时间地方“长老仍喜述其施济事”(《桐城耆旧传》)。姚莹在《留别台中人士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昔贤清节恐人知，后世徒工作茧丝。百姓可真无疾苦？一生何必计盈亏。酿金父老偿官急，愧米胥徒感旧悲。输与百钱相送别，高风吾已愧当时。”在《题澄心图后复作一首奉别》中指斥：“大官纷纷击车毂，日望牙旗树高纛。小官攘攘承下风，咳唾九天尽珠玉。钱

多未厌妻孥喜，那问苍天哭茅屋。”对贪官污吏的鞭挞，对人民的深深同情，表现出姚莹忠厚正直的人品和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。

姚莹还能深明大义，为了从大局出发，善于和同僚相处。当时的台湾总兵达洪阿为满洲人，他傲慢无理，轻蔑同僚，侮辱下属，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。姚莹担任台湾兵道，许多重大方针政策，设防部署，均出自他的谋划，难免为总兵所忌。但当强敌压境，国难当头之际，他能放弃私人成见，甚至煞费苦心，谨慎应付，乃至“委曲求全”。他在共同对敌的大势下能宽容忍让，和衷共济，对抵抗英国侵略者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，这也是他高风亮节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后来终于感动了达洪阿。其子姚瀚昌在为其所作的《年谱》中指出：“台湾总兵达洪阿公，性过刚，同官鲜与合。府君初至，亦见齟齬，凡历二年，务交以诚，一旦诣谢曰：‘武人不学，为君姑容久矣。自后诸事悉听君，死生祸福，愿与共之。’遂结为兄弟交。夷数犯台湾，皆击退，文武同心故也。”

对流毒全国的帝国主义鸦片输入，林则徐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，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，姚莹积极地予以支持。当鸦片战争发生时，他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：

“莹，职在守土，惟知守土而已，不敢他及也。”（《东溪文集》卷七）他深感“台湾孤悬海外，口岸处处可通”，因此必须严加海防的各项措施。他积极配合总兵达洪阿，出谋划策，身体力行，对台湾安平大港口、四草海口、五汊港、香山港等十七个重港，逐一进行检查，对应敌设防等具体

事宜，进行周密部署。面对“船坚炮利”的英军，他坚持守土，敢于抗击。他在《咏古》诗中写道：“忽闻鼓角动，拔剑夜数起。丈夫志念国，富贵何足疑。裹甲赴战场，全身以为耻。”并表示愿与爱国壮士“誓欲同生死”。姚莹奉命筹度全台事宜，并召募二三万人，时刻准备英兵偷袭。由于他的胜算超人，乃致“英夷不敢近，或遭多次失败”。为此，方东树赞他为“海上鲸鲵”，“楼船汉将”。由于姚莹保卫了台湾，伸张了民气，受到了友人和同僚的称赞，为广大百姓所爱戴，从而也招致了权奸的忌恨。外有帝国主义挑拨，内有璞鼎查、穆彰阿之流诬陷，说他在台的缴获是“船遭风险，各官冒功欺上”，姚莹竟被昏庸的清廷统治者逮捕入狱。当时台湾群众数千人，“签呈日诉于大府行台，涕泣保留”，可见姚莹深得人心。他被拘禁，人们深感“长城被毁”。一八四三年十月初，姚莹被逮至京时，城郊的长辛店有三十多名京官、名士怀着郁闷愤慨的心情，前来迎接被道光皇帝严旨革职的台湾道姚莹。他们的正义举动，是对姚莹在台湾抗英的有力支持，也是对他被诬拿问的深切同情。此时朝野上下，舆论纷纷，甚至“闺阁中亦多感咏”。山阳鲁一同在《论姚莹功罪状》中指出：莹在台湾抗英，只“见其功，未见其罪”（《通甫类稿》卷四）。

清朝统治者迫于舆论的压力，姚莹于十月六日入狱，十八日即被赦出。爱国志士、广大群众深感欣慰。方东树怀着喜悦的心情，含着深永的友谊，写了《喜闻石甫释罪出狱用东坡西台诗句示伯符》一诗，诗中说：“遭命忽更

逢造命，致身谁忍但谋身。只今外国应知惧，宣布中和自海滨。”姚莹拥护林则徐，为禁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，为守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。人民支持他，而帝国主义者与投降派都害怕他、痛恨他，他们都要以除掉姚莹而后快。粤督耆英就曾致书京师要人，谓“不杀道镇，我辈无立足之地”（《姚莹年谱》）。

和历史上许多著名诗人和文士一样，姚莹的爱国和忠君思想，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。姚莹的一生，也是忠于清朝统治者的一生。尽管他被昏愆的统治者逮捕入狱，蒙受不白之冤，但当统治者重新起用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对统治者感激涕零。他在《闻诏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诏书读罢涕洟澜，搔首江湖恨百端。君主如天频罪己，诸公何意敢求安。眼中遗孽行犹在，事后深宫胆尚寒。惟祝无疆千万寿，升平久愧腐儒冠。”

为了向腐朽的清廷和贪官奸佞作斗争，和实现“有无相恤，患难相救，夜不闭户，道不拾遗，男女别涂，选举上德”的太平世界，洪秀全等领导的广大太平军英勇起事。这种农业社会主义——曾被马克思称为“中国的社会主义”（转引自范文澜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第九十六页）——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。统治者起用姚莹，是利用他的统军之才，来镇压人民的起义大军。他竟然一再献计献策，甚至不惜高龄病身，奔波劳碌。在赞理军务过程中，他往来筹商，常“一日数发书，心无停思，手无停笔”（《年谱》），在其《遗稿续编》中写状文、书信竟达一百零五篇。他提出“严密堵截”，“八面

环攻”等计策，终因年事已高，又身有疾病，“即有谋，又不见用”（《桐城耆旧传》），乃至“忧懣无计”。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之后，节节进取，形势不断发展，清军每战必败。当时咸丰皇帝派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督军围攻永安城。咸丰二年二月（1852），城中粮尽，太平军突围，大破清军，并杀了四个总兵官。革命形势在发展，姚莹虽日夜忧念军事，也无法挽救溃败的局面，致使六十八岁高龄的姚莹“疾愈甚”。当岳州攻陷之后，便因“焦劳忧郁”、“旧疾复作”而与世长辞。姚莹终于带着对清皇室的愚忠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
姚莹作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，当国家、民族受到侵略时，他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；当领土受到侵犯、人民遇到灾难时，他能坚决守卫国土，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，他能“裹甲赴战场”，以“全身为耻”。他的功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不可磨灭的。但姚莹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，他的勇和毅、胆和识，都是以他的“怀忠义”和“念国恩”为基础的，因而他参与了对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镇压，站在革命力量的对立面。幸而在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正在奔腾跃进之时，他因高龄有病，不受重用，议状不被采纳，终至忧愤而死，这倒避免了他对革命力量可能犯下的更为严重的错误。

二

姚莹不仅是杰出的将才，而且他的诗文俱佳，才华艳

发。他是应该载入中国文学史册的。他的《论诗绝句六十首》内容十分丰富，对诗骚、汉魏乐府到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的历代诗歌都有所论述，对各个朝代主要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，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(1)肯定了推动诗歌发展的代表人物，批评了诗歌创作中的不良风气

姚莹在《论诗绝句六十首》中，重视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乐府》对后世的影响。作者曾用较多的时间学习汉魏之作，所谓“辛苦十年摹汉魏”，可能由于偏于形式的学习而未得要领。但对汉魏时期的作品，其主流是予以肯定的。“建安后格多新丽”，对建安之后，诗风转向追求语言的新巧华丽，文风绮靡，走上形式主义道路，姚莹是取否定态度的。但对这一时期的诗文，也作了一些肯定：

宁知陆海潘江外，别让临淄咏史诗。

（《论诗绝句·庾父当年笑左思》）

欲知遥深清峻旨，嵇公琴散阮公怀。

（《论诗绝句·建安后格多新丽》）

当时秘监多金缕，未抵参军累句工。

（《论诗绝句·乐府惊才代不同》）

姚莹十分赞赏左思的“咏史诗”。这些托古讽今之作，既有对腐朽制度的揭露，也有对权贵之士的蔑视；既慨叹“奇才”的被埋“草泽”，又歌咏贫士生活之困苦。有的诗篇还流露和显示了谦虚耿直的性格和高风亮节的情操。虽时流露消极避世思想，但总的说来，笔力充沛，气干云

霄，震人心脾。左思“其雄在才”，“其高在志”，他胸次浩落，甚至被赞为“一代伟人”。左思的“奇才”和“高志”，陆机和潘岳是不得不“别让”于他的。

嵇康是思想家、文学家、书画家和音乐家，他的诗作不多，“然托喻清远，良有鉴裁”，不失为“高流”（《诗品》）。他的《赠秀才入军》，对行军乐趣的描绘流自肺腑。他的《幽愤诗》对耿介胸怀的自述，体现了他“人品胸次”之高（陈绎曾《诗谱》）。“本有济世志”（《晋书·阮籍传》）的阮籍，他表面佯狂，其实内心是十分痛苦的，他对虚伪礼法在骨子里是强烈不满的。他的八十二首《咏怀诗》，虽有不少消极因素，但从主流来看，也还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，抨击了吃人礼教的虚伪，并反映了正直之士在黑暗恐怖政治下的“忧思独伤心”。他“遥深”的诗旨，对人世的感慨和忧伤，以及个人苦闷的心胸和压抑的情绪，都通过曲折幽隐、深沉美丽的语言表现出来。对嵇、阮二公的清峻之旨和幽深愤激之情的抒发，姚莹也是颇为赞赏的。

至于鲍照，他以“警挺”的发唱，有力地反映了现实。以鲜明的爱憎，抨击了当时的政治，其作品深婉动人，倾炫心魄。在南朝，特别是齐梁时期，由于统治者的带头制作，一般贵族文人“弥尚丽靡”，“逾于往时”（《梁书·庾肩吾传》），使诗风更趋浮艳，特别是所谓“宫体诗”的风靡。这些可恶的艳情之篇，情落的变态之作，简直是对艺术的亵渎。所以姚莹盛赞鲍照的诗，堪称独步江东，并明确地指出：“当时秘监多金缕”，但却“未抵参军累句

工”。

对唐代，姚莹特别推崇陈子昂的“力振衰淫”之功，并竭力称道朱熹对陈子昂《感遇诗》的推崇，指出“特识曾推感遇功”。

对盛唐诗人，姚莹十分推崇李白和杜甫。“蜀道吟成泣鬼神，歌行何似古风淳”，李白根据乐府旧题，通过飞腾的想象写出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《蜀道难》，不仅表现蜀地山川的奇险壮丽，也寄寓着胸中的幽愤和感慨，故赞其诗能“泣鬼神”。对杜甫的“乾坤奥气”，姚莹十分称赏。对以写边塞诗见长的王昌龄、李颀、岑参、高适等，姚莹也都给予应有的肯定。他明确提出自己对盛唐的高度评价：“盛唐兴趣是吾师”。对“文体能兴八代衰”的韩愈，姚莹从文学发展上给予评价，说他的诗歌能“自辟藩篱”，彻底摆脱六朝骈丽文风，而使“颓纲复振”。韩愈在振兴诗风方面，对宋代梅尧臣、欧阳修等都有一定影响。中唐元和年间的诗坛，姚莹深深赞许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，肯定其“直歌其事”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鲜明强烈的政治态度。

对宋代，姚莹首先指出“西昆体”的“雕章丽句”带来的结果是“秾丽妆成一曲休”。杨亿、钱惟演、刘筠等人的相互酬唱，由于只拾取前人的“芳润”，在形式上只是玩弄辞章和典故，在内容上一味地歌功颂德，粉饰太平，在诗歌题材上或咏宫廷人物，或写爱情景事，“缀风月、弄花草”，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现实。

开宋代诗风的重要诗人，首推梅尧臣。他对为时人争

效，弥漫诗坛的形式主义代表“西昆体”较早地给予针砭。他的诗“去浮靡之习”，“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，存古谈之道”（龚啸《宛陵先生集·附录》），在宋代是具有开创之功的。他从“刺”与“美”的创作目的出发，写了大胆反映现实的优秀诗篇，既讽刺与谴责了当权者的嫉贤妒能，也抨击了最高统治者的苛残役政，还怀着极大的同情，写了一些反映人民痛苦生活的篇章。梅尧臣诗歌的风格是多样化的。他的诗既“淡语幽香”，又“韵格工腴”，能“状难写之景，如在目前；含不尽之意，见于言外”（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）。梅诗在当时影响很大，欧公终生佩服，真是梅尧臣的最深知己。

宋代还有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流派，即“江西诗派”。吕本中曾作《江西诗派图》，最早地提出这名称。这个诗派的一些作者脱离生活，过分追求简古，一味地从古语中东拆西补，或“殆同书钞”，或生硬晦涩，缺少生活气息，缺乏动人情味。姚莹用生动的比喻写出自己的不同看法：“当时颇笑陈无己，辛苦吟成蠹被温。”这幽默含笑的批评，就是深刻有力的否定。

对金元时期，姚莹十分推崇元好问。诗人怀念故国，以及在异族统治下悲凉心境的揭示和抒发，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，确有相似之处。

明代长期统治文坛而且带来不良后果的是“台阁体”。这种脱离现实，生活贫乏的诗文，只求形式上的典雅，不求内容上的充实。以李梦阳、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，深感“台阁体”的“萎弱”（李梦阳），打出复古的旗号与之

相对抗。他们抵制“台阁体”的不正之风，是一种改革，也有所前进。但总的来说，“前七子”的复古，仍偏离文学创作的规律，有其消极的一面。姚莹肯定李梦阳的才名，称颂何景明的诗作“俊逸”和“雄骏”，是从积极方面给予肯定的。

对清代，姚莹极推崇王士禛。他认为李攀龙之后，只有这位“雄奇”一世的诗人可以引为朋辈了。王士禛标举的“神韵”，其实是皎然、司空图、严羽等人论诗主张意在言外的继续和发展。这种善于捕捉刹那间的感受，敏于搜寻“眼前景”的妙境，在艺术创作上颇有借鉴之处。从论诗绝句及姚莹其他有关诗篇来看，更多的则赞成其“学力”与“性情”之说。如在《师友诗传录》中郎廷槐提出：“作诗，学力与性情，必兼具而后愉快，愚以为学力深，始能见性情。”王的回答是：“司空表圣云：‘不著一字，尽得风流’，此性情之说也；扬子云云：‘读千赋则能赋’，此学问之说也。二者相辅而行，不可偏废。”（《清诗话》上册第一二五页）既重“性情”，又重“学力”，二者相辅而行，自然会使诗歌的创作趋于妙境，不仅古代诗人如此，新时代的诗人亦何独不然？这个看法是全面的、可取的。有“学力”而无“性情”，易枯索而无诗味；有“性情”而无“学力”，易使作品肤浅浮泛，空虚缥缈。所以姚莹不喜枯率之作，即所谓“莫作寒岩稿木僧”，故肯定“公安派”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可取之处，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必须反映现实，抒写情性。

姚莹把握诗歌发展的历史线索，肯定了代表正确诗风

的作家和作品，批评了诗歌创作上的不良风气，虽然有的地方认识还不够深刻、全面，但总的说来，他的许多见解，其主要方面还是健康的、正确的，直至今天，仍有值得借鉴之处。

(2) 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，歌赞一些爱国忧民的优秀诗章

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。诗歌等文艺作品总是通过作家主观情志的抒发，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作用的。当姚莹“悟得兴观旨”之后，便自觉地用诗歌来抒发思想感情。在《谣变序》中姚莹写道：“余幼读诗，则喜言兴、观、群、怨。”（《后湘诗集》卷三）他在这篇六百五十四字的序言中，四次提到了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。他对孔子的这个论说，颇为欣赏，并贯串于自己的创作之中。

孔子在《论语·阳货》篇中指出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孔子的所谓可以“兴”，孔安国注为“引类连譬”；朱熹注作“感发志意”，即托物寓兴，以寄其志。姚莹在《谣变序》一开始就引用：“书曰：诗言志，歌永言。”修身须先学诗，言志当先用诗。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（毛萸《诗大序》），这个关于诗人的政治倾向，是孔子首先注意到的，也是他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的根本之点。所谓“观”，郑玄注为“观风俗之盛衰”，朱熹注作“考见得失”，即为社会风俗，国家的兴衰得失的考察和认识，这虽然是“治人”的统治者的事情，但“酌人之言”，可以“补己之过”（《白香山集》卷四十八《策林》六十九）。

能见得失，开讽刺之道，客观上对人民群众是有好处的。所谓“群”，即孔安国注的“群居相切磋”之意。所谓“怨”，孔安国注为“怨刺上政”，即对不良政治的讽刺。从诗可以表达“怨”的情绪看，诗歌不仅是“言志”的工具，同时也是抒情的工具。正如姚莹所说：诗歌是表达人们情感的，“乐则笑，哀则号，悲则泣，忧则叹，怨则吁情”（《谣变序》）。

孔子诗教的另一方面是主张“温柔敦厚”，这虽有其美学价值，但姚莹特别地赞赏他的兴、观、群、怨说。这是对当时文学艺术创作的总结，强调了文学的社会作用，重视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，要求文学艺术不要脱离一定社会的政治。孔子的这些观点，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，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。但这个观点对后来各个朝代都有很深的影晌。作为桐城派的杰出后裔，姚莹接受了这个诗教，又贯串了“义理”之说，因而他认为诗与文都要做到“道与艺合”。这个道即是“忠义之节，仁孝之怀”。有了这个“阐事物之理”的道，无论作诗为文，便可“发之为炳炳琅琅之辞，诵之有铿铿鏘鏘之节”了（《东溪外集·复杨君论诗文书》）。

由于姚莹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，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，因而对爱国忧民的作家和作品作了较多的称述。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，他的变革主张失败，其伟大的洁白身躯自沉汨罗，赢得千百年来人们的无限崇敬和感奋，姚莹一再地予以歌赞。

对李商隐的忧国诗篇，姚莹也给予充分的肯定，所谓

“牙旗玉帐真忧国”。李商隐的《有感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哭刘蕡》和《行次西郊作一百韵》等诗，忧念时艰，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倾向性。对这些有所寄寓的政治性较强诗篇的肯定，正是姚莹忧念时艰的爱国思想的表现。

爱国诗篇写得最多最感人的要推宋代的陆游。姚莹论诗绝句中的“铁马楼船风雪里，中原北望气如虹”，就是采自他的《书愤》诗。杰出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，其思想，永远光耀史册；其诗篇，永远熠熠生辉。“剑南身后有遗山”，姚莹也是就元好问诗篇中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而肯定其承继关系的。

清代的屈大均，继承屈原爱国主义传统，称颂诗人邝露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，并写有《拜三闾大夫墓》、《题招屈原》等诗作，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思想。姚莹深为同情，故说“分明哀怨楚湘纍”。

对反映社会现实，揭示人民群众疾苦的诗，姚莹基于“兴观”诗旨，十分重视。李白的诗，姚莹特别称道他的《古风》。这组诗大多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，抒发自己的感慨，或寄寓胸中抱负的。既有对统治者的揭露，也有对人民的同情。杜甫生在唐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时期，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大动荡时期，又经历了安史之乱，饱经忧患，颠沛流离，他的诗歌创作，深刻而全面地反映了现实，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一面镜子，他的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和《奉先咏怀》等杰作，已成“诗史”而永远流传。

对白居易，姚莹明确提出：“秦中诸作国风源。”“秦中诸作”，主要是指白居易的“新乐府”等具有强烈反映

现实的作品，尖锐揭露和讽刺黑暗政治的诗篇。姚莹正本述源，肯定这些作品，是他重视诗歌社会功能的突出表现。

还有“文掩诗名”的曾巩，也写有反映现实的优秀诗作，姚莹也注意到了。宋代范成大有《催租行》、《后催租行》等诗，揭露了封建剥削，在一定程度上关心农民的疾苦。明代的高启，也写有《田家行》、《养蚕词》、《放牛词》等反映农民疾苦的诗篇。即如以“鬼趣”目之的钟惺，也写有反映现实、关切人民的诗作。姚莹认为诗人必须关心世务，“忧时悯俗”（《东溟文集·郑云麓诗序》），因而对深切反映现实，表现人民疾苦的诗篇，总是在他重视的范围之内。

也许因为作者是抗击外国侵略者战功卓著的人物，不仅有文韬，也有武略，故对“谈兵”特别感到兴趣。对诗人兼有武功，或对用兵有卓见的诗人，姚莹总不肯放过。对唐代边塞派诗人王昌龄、李颀、高适、岑参，他怀着真挚的感情赞颂他们。对亲历战乱，写过《春陵行》等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的元结，给予由衷的歌赞。对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，对用兵之道有精深研究，并提出一些高明见解的杜牧非常赞赏，在绝句中写道：“别识谈兵杜牧之。”

明代的“皇甫四杰”之一皇甫冲，既善于写诗，又写有《几策兵统》、《枕戈杂言》。姚莹对他热情称赞。姚莹的同乡齐之鸾，曾在明代做过兵科给事中，宸濠反时，之鸾参加过征讨，并写了《入夏》、《南征》两组诗，既是战事的记载，又有对壮丽山河的描绘，姚莹同样给予热情肯定。